

戰隱真威，同人出代

——西安崇一堂碑與湯若望《天主正道解略》*

丁銳中

[提要] 發現於西安崇一堂的《天主正道解略碑》，刻立於 1643 年，其內容來源於湯若望所撰《進呈書像·天主正道解略》。《進呈書像》是湯氏借修琴翻譯西文之際呈獻給崇禎皇帝的天主教圖文解釋文本。《天主正道解略》是其中首篇，文不足千字，然意指天主要旨。傳教士郭崇仁和梅高繼承湯氏在陝教務，感念其奠基之功，並將其文刻碑流傳。此外，《天主正道解略》內容在宣傳教義方面的價值也是郭梅二人刻碑的一個重要原由。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正道解略》後來被收入何世貞的《崇正必辯》和黃保祿的《正教奉褒》。

[關鍵詞] 崇一堂碑 湯若望 《天主正道解略》 天主正道

[中圖分類號] B979; K248.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1 - 0087 - 07

在中國基督宗教流傳史上，碑刻資料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領域。明末天啟年間在西安近郊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開啟了基督宗教在華史研究的重要維度。近年來，經過筆者在西北地區的多次考察，收集了散落在各地上百通教會碑刻。這些碑刻對西北地區基督宗教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價值。發現於西安北堂（明末稱“崇一堂”）的《天主正道解略碑》刻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發現後的十餘年間。這通碑刻內容來源於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所撰《進呈書像》中的《天主正道解略》，其內容不過千字，但言簡意賅，直指天主最高主宰性，勸誡人們信仰天主正道。

一、《天主正道解略碑》介紹

1924 年 5 月 1 日，在西安糖坊街天主堂（一般稱為西安北堂）發現了明末石碑一通，名為《天主正道解略碑》。^①該碑出土後，教會曾拓印數份，部分被外國傳教士寄往國外。原碑一直保留在糖坊街天主堂，後不幸佚失。^②20 世紀八十年代，天主教西安教區在恢復重建北堂時，依照該碑拓片，重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秦晉地區天主教珍稀碑刻蒐集、整理與研究”（項目號：20BZJ031）的階段性成果。

新刻製《天主正道解略碑》，並嵌於教堂牆體。

碑額刻十字架，周圍有拉丁文頌詩

上 DULCE LIGNUM 下 DULCCIA FE

左 RENS PONDERA 右 DULCES CLAVOS^③

碑文：^④

天主正道解略

天主者，天上真主，主天亦主地，主神，主人，亦主百物，譬猶國家之有帝王，罔所不統，理無二上，不容齊耦，勢在必從，不容疑二者也。試觀普世之人，莫不瞻天敬天。蓋天非蒼蒼上覆之謂，正以上有真主，人心對之，自然加肅，不敢戲渝。比之臣民，望九重而叩，叩九重內有聖明，非徒叩也。且天主者，自立神體，不着形聲，大智全能。造化萬有，而嘗宰制之。更於萬有之中，加愛人類。故當創造初之時，賦以正理，而人各有生之初。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性教也，以故趨善避惡，不慮而知。凡遇忠孝大節，舉仰慕之若渴。凡遇奸頑大慝，舉疾惡之若仇。而有疾痛，則呼父母；有患難，則呼天。人窮反本於茲益著，豈非秉彝同然哉！獨惜世風日下，人慾橫流，人生其間，漸淪昏罔，而性教不足以勝之。

於是，天主大發仁慈，戢隱真威，同人出代，而不着形聲。天主之體，降寓形聲人體之中。在世凡三十有三載，闡揚大道，普拯群生，而恩施此尤摯矣。救世功畢，亭午升真，遺有經典六十三冊，並命宗徒等佈教萬國。凡遵其教者，必與上升，以享真福。蓋天主至公，無善不報，此又比之人主，論功行賞，輕重大小，並及靡遺者然。從此宗徒等奔走四方，流行教法，代有好修樂道之士，上順主命，下重人靈，相繼傳宣，以至今日。要總之，天主正道，要與釋道等教殊趣，以昭事天地真主為宗，以導人仁睦忠良為本，以悔罪遷善入門，以生死大事有備無患為究竟。王者用之治國，則俗樸風醇，人心和輯；君子奉之修身，則存順歿寧，永遠吉祥。誠普世之人，所當其務欽崇，以隆造物之本始，以一人生之歸向者也。窮西籍充棟，奧義難窮。茲特陳其大略如此。

癸未年仲冬^⑤

泰西修士 郭崇仁 梅高 立石

PP. EUROPAE SOCETATS^⑥ ESU.

SCULP. Ano DNI^⑦ M.DC. 44.^⑧

極西

耶穌會修士於萬曆丙辰入中國建堂闡教，廣化黎民，於兩京十三(省)，萬曆後二十三載，^⑨刊碑長安，以為記。

趙國衛沐手書

長安卜棟鐫字

立碑者為葡萄牙耶穌會教士郭崇仁(Ignatius da Costa)和梅高(Joseph d'Almeida)

PP. EUROPAE. SOCETATS ESU. SCULP. Ano DNI. M. DC. 44.意為“歐洲耶穌會司鐸，紀元1644年立”。

二、《天主正道解略碑》內容探源

經過爬梳文獻，比對探研，發現《天主正道解略碑》碑文內容正是來源於湯若望撰《進呈書像·

天主正道解略》。

明朝末年內憂外患，崇禎皇帝有力挽狂瀾之意，但時局發展卻不盡如其所願。他竟然有閒暇時間看到利瑪竇所進獻之西琴，遂即傳令湯若望修整之，並翻譯考釋琴座所載西文。湯氏借此機會，欲向崇禎帝闡揚基督大道。在翻譯琴座西文時，湯若望即將西書一部完整翻譯為中文，與天主畫像一函同所修西琴一併呈進崇禎皇帝御覽。同時，他還呈進自己所著《書像解略》，“另著有《書像解略》一冊附陳大要幸荷”。^⑩進呈皇帝御覽之後，湯氏將西書譯稿、所載本土化處理的畫像與解略文字整理付刻，是名為《進呈書像》。黃伯祿所撰《正教奉褒》也提到湯若望《進呈書像》成書一事，“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先是有葡槐國君瑪西理飭工用細緻羊鞞裝成冊頁一軼，彩繪天主降凡一生事蹟各圖，又用蠟質裝成三王來朝天主聖像一座，外施彩色，俱郵寄中華，託湯若望轉贈明帝。若望將圖中聖跡，釋以華文，工楷謄繕。至是，若望恭齋赴朝進呈。”^⑪

本文所依據的《進呈書像》是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⑫該藏本上並未說明刊書地點，從湯氏自序中所提及“今年春”“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及“時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孟冬朔後一日，耶穌會士湯若望撰”，可知該書於崇禎十三年（1640）十月初二日整理撰序完成，進呈御覽是在同年七月二十三日。撰刻地點應該在北京，因為湯氏當時一直在北京。^⑬巴黎國圖本保存較好，封面有書名“進呈書像”，蓋有耶穌會會徽（疑為後來所蓋）。內容依次是《進呈書像自序》、《天主正道解略》、《是像為三王朝獻天主耶穌》、《解書面四像》、《閱西書法》、《總題圖》、《總說》7 篇文字。正文部分為 46 幅圖並配解說文字。琴座上所載西文具體內容不得而知，據湯氏《進呈書像·自序》中僅數字提及，“原係西古聖讚誦天主詞章”。^⑭

《進呈書像》首篇文字《天主正道解略》正是《天主正道解略碑》碑文的確切來源。書中《天主正道解略》在文末還有“臣故不揣荒陋，敢因進書而陳其大略如此，伏惟，聖明垂察焉”。而《天主正道解略碑》碑文末加有“窮西籍充棟，奧義難窮。茲特陳其大略如此”。郭梅二人刪“臣故不揣荒陋，敢因進書而”以及“伏惟，聖明垂察焉”，而增“窮西籍充棟，奧義難窮”。從上文所提湯氏序文及《天主正道解略》文末字句，可知崇禎皇帝應該看到《天主正道解略》一文。

三、郭梅二人緣何將《天主正道解略》刻碑並立於西安崇一堂

湯若望於 1640 年十月成書《進呈書像》，三年之後（1643 年十一月）郭崇仁和梅高即以《天主正道解略》為內容刻碑而樹於西安崇一堂。^⑮原因何在？筆者認為這與湯若望在西安傳教並組織營建天主堂有關。

天啟七年（1627），在陝西傳教的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被調往杭州。同年，湯若望受任接替金氏來陝佈道。湯氏剛到西安之初因傳教就遭遇侮辱甚至牢獄之苦，獲得辯釋後逐漸引導多人受洗入教。費賴之記述，“已而會中委其管理陝西省教務。居西安數年，傳佈宗教，研究天文，無時或息。當時侮謗者眾，且被人訴之於法庭。受平民之侮辱，士大夫之輕視，外受譏謗，內感艱辛。若望曾云：南京之牢獄較優於西安之自由，可以見其遭際也。嗣後反對者皆服其堅忍，侮謗之風遂息。信教者日眾，士大夫漸善遇之，建築壯麗教堂一所，其費用幾盡出於佈施。開堂之日，受洗者五十人。”^⑯次年（崇禎元年，1628），時已與湯氏在北京結識的涇陽人王徵返籍為父守制，且已奉教十餘年，信德漸篤。^⑰王徵積極捐金為教士購置房舍，並且號召西安地區的達官顯赫慷慨解囊以資建造教堂。經過多方努力，壯麗高大的天主堂建成，名之為“崇一堂”。“崇一堂”之意取自天主十誡之首誡，即崇拜一天主於萬物之上。王徵在日記小引中開篇指明，“崇一堂者，向余理維揚

時，因遠西諸儒振鐸中土，寓我省會，爰置此堂，以為朝夕欽崇天主上帝之所。蓋天主十誡首云，‘一欽崇一天主在萬物之上’，故嘗謬擬一聯：‘自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以來，兩間無兩主宰；從有帝有王有聖有賢而後，一總是一欽崇’。遂取此義名堂，聊旌一念欽崇之意云。”¹⁹王徵為崇一堂所撰楹聯，“自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以來，兩間無兩主宰；從有帝有王有聖有賢而後，一總是一欽崇”則體現了他對天主屬性的深切體認。據說新教堂的屋頂上豎立着一座鍍金的十字架，堂內正中設有基督之像。²⁰崇一堂建成後，陝西總督還派人送來牌匾以示祝賀。²¹也就是在這一年的夏季，具體時間為1628年7月31日，湯若望在崇一堂舉行了信仰生平中重要而又神聖的耶穌會發永願儀式。²²湯氏選擇崇一堂作為發永願之地，足見他對該地傳教情感的傾注。崇一堂也正是湯若望入華後主持營建的第一座天主堂。在陝期間，湯若望發揮自己在科學方面的專長，成功預測了1628年1月21日的月食，這也為他贏得了一定的名聲，也便於傳揚天主教。²³湯若望延續着利瑪竇(Matteo Ricci)的路線，通過科學知識贏得認可，進而結交名士，廣揚教旨。在王徵等陝西籍奉教者的幫助下，湯若望終於立足腳跟，開始為陝西地區的傳教工作奠下重要基石。“當時所有傳教根據地的建立，都是仰賴奉教官吏們鋪好了路子，他們清除了道路上首要障礙。陝西傳教區的建立，亦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建立起來的。這些奉教官吏們對於教會之熱心，樂意相助，以及各種傑出的功勞，傳教年報中一旦提及之，則對他們讚不絕口。因此傳教士是盡心盡力地勸化官吏們奉教。最終使得傳教事業幾乎都是處於有地位的權要保护和幫助之下。這些奉教官吏的事例對平民很有影響。甚至沒有奉教的官吏就像他們奉教的同僚們那樣熱烈地關心，並以此推進傳教事業。這一情形也會在這座中國西北古城裡重現。”²⁴

湯若望在陝西傳教時可能主要寓居在西安城內的崇一堂，王徵里居期間從涇陽魯橋出發，前往省城崇一堂與湯若望朝夕論教，“比自維揚歸里，會湯道未先生，寓此堂中，振揚天主聖教。余間一躬詣，每留連十數日，多聞所未聞。此則坐間筆記之話言也。先生每夕坐間，為余譯述西賢苦修會中奇跡一二段，以為日課。”²⁵湯若望為王徵講述了出自《沙漠聖父傳》等西文聖傳修道故事，²⁶王徵筆記修道內容並做按語心得，最終完成《崇一堂日記隨筆》，後於崇禎十一年(1638)整理刊刻。²⁷

湯若望還對西安這座古城做了多方面考察，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曾在他的報告中對西安古城有所描述，“這座城市周圍是由二十二尺高的，形成一個正規的、厚重的城牆圍繞的四方形，其自東到西的方面略長。四面城牆，每面之正中皆有自明初以來所建立之城門一座，四周城門與建於其上的城樓，崇峨壯偉，為一切行旅者所稱讚與誇耀”，據考證衛匡國的這個報告得自湯若望。²⁸崇禎三年(1630)，因在京治曆的耶穌會士鄧玉涵(Johann Schreck)病重，經徐光啟奏請，崇禎帝詔令准湯若望返京任職於欽天監。離陝之際，省城西安的官吏們前來向他祝賀，並為他備好了行轎一頂以及馱載行囊和飲食的牲畜若干，沿途官吏亦迎送照料有加。²⁹湯若望被召入京修曆以後，西安教務由郭崇仁、梅高二人負責。

崇禎十六年(1643)十月，李自成率軍攻破西安，次年正月初一建立大順政權。起義軍在西安城內搜捕到郭崇仁和梅高，查明事實後，釋放兩位傳教士並予以保護。費賴之記述，“一六四三年李自成陷西安時，納爵與梅高神父同在城中，共被擒送至自成所，自成嚴詞詰問二神父來此何為。二神父答為西士，來華傳佈唯一真主之教。自成釋不問，並諭所佈，不得侵犯西士之身體財物。”³⁰李自成起義軍佔領西安之際，正是郭梅二人將湯若望《天主正道解略》刻碑樹於崇一堂的時間。鑒於湯若望在陝教務開展方面的奠基性成績，他的繼承人郭崇仁和梅高兩位神父將其所撰《天主正道解略》刻碑流傳，實為情理之中。實際上，從《天主正道解略》之內容來分析看，郭梅二人刻立此

碑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湯若望在《天主正道解略》中闡述了天主的最高主宰性、自在性體的屬性、天主降生救世佈教以及勸誡世人信奉天主正道。

對於天主的最高主宰性，湯氏直指天主教所信仰的最高對象是天、地、神、人、萬物的主宰，“天主，亦主地、主神、主人，亦主百物”。^④他還以類比的方式說明天主是唯一主宰者，“譬猶國家之有帝王，罔所不統，理無二上，不容齊耦，勢在必從，不容疑二者也”。利瑪竇在《天主實義引》及《天主實義》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中對天主的最高主宰性也進行了類似的闡發，“邦國有主，天地獨無主乎？國統於一，天地有二主乎？”“能主宰人心……吾因是知乾坤之內，雖有鬼神多品，獨有一天主，始製作天地人物，而時主宰存安之。”^⑤利氏分兩步對此進行論述：第一，他以三個論點證明天主是人心與宇宙的主宰；第二，他以三個論點也證明天主是創造主。^⑥湯氏所言及人所敬天，是因為天上有主，“試觀普世之人，莫不瞻天敬天。蓋天非蒼蒼上覆之謂，正以上有真主”，^⑦這一論述與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說法接近，“人誰不仰目觀天？觀天之際，誰不默自歎曰：‘斯其中必有主之哉！’”^⑧湯氏闡述天主之性的理路與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的方式是一脈相承的。與利氏詳而推演論述相比較，《天主正道解略》論述雖然簡略，但字字都關涉要義。

傳教士的這種宣教方式，直接影響了奉教儒者對天主的認知和接受。王徵在《畏天愛人極論》中亦對天主的最高主宰性沿用以上所述方式進行了論述，“陡斯者，大主之譯，蓋為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一真正大主宰云。天地間凡物無不有一主宰，而非其大。喻如一人之身，有一主焉，心神是也。所以統領五官四體而綱維乎百為者，悉此焉宰之。推而言之，一家有一家之主，家人之嚴君是。一國有一國之主，一國之君王是。天下有天下之主，一世之總王是。主而至一世之總，王亦大矣。然果能如心神之宰一身者乎？不能也。則必有一大主默宰其間，舉四海萬國之大，視同彈丸，若運旋一掌之內，無所不照臨，無所不瞻養，無所不震攝而提扶；而且無遠弗屆，無微弗入，無隱弗燭；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上地下，總皆臨蒞之區；古來今，渾囿一視之中，蓋心神之宰一身之易之妙，猶未足仿佛其萬一耳。此非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原初之陡斯，其疇足以當此？”^⑨從利瑪竇到湯若望，他們在引入天主概念時，先以其最高主宰性為突破口，以對應中國人信仰之天，正如有學者指出，“利瑪竇有很獨特的方法，先證明天主是一個‘主宰者’，然後證明祂是一個創造者。他這樣把次序顛覆是因為他考慮到中國人更容易接受天主是主宰者。”^⑩正是在利瑪竇等傳教士的宣教指引下，王徵等奉教儒者才於信仰世界激活了上古時期“天”這一最高主宰概念。

湯氏在文中也論及天主自立神體，全知全能，創造萬物。“且天主者，自立神體，不着形聲，大智全能。造化萬有，而嘗宰制之。更於萬有之中，加愛人類。”^⑪與此同旨，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亦指出，“天主則無始無終，而為萬物始焉，為萬物根柢焉。無天主則無物矣。物由天主生，天主無所有生也。”^⑫可以說，湯氏的闡釋邏輯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由利氏鑿開的傳輸之渠。

湯氏在文中認為“性教”可以使人“趨善避惡”、“仰慕忠孝大節”、“疾惡奸頑大慝”、“疾痛呼父母”、“患難呼天”，但面對“世風日下，人慾橫流”，性教則不足以拯救人類於昏罔之中。這裡所謂“性教”來自朱熹在《中庸章句》的論述。《中庸》中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⑬朱熹在《中庸》論述的基礎上，結合張載、程頤等人的論點逐漸形成理學之“性教觀”。湯若望關於“性教”的闡述觀點及其批判有其合理性，但並未完全抓住“性教”之理。

湯氏在文中還簡要介紹了天主降生、救贖群生的教義。天主降生成人體，“天主大發仁慈，戢隱真威，同人出代，而不着形聲。天主之體，降寓形聲人體之中”，此即耶穌的誕生。“在世凡三十

有三載，闡揚大道，普拯群生，而恩施此尤摯矢。救世功畢，亭午升真，遺有經典六十三冊，並命宗徒等佈教萬國。”⁴⁰耶穌 30 歲開始傳教。三年之後，33 歲的耶穌被釘死十字架，後由其門徒走向各地傳播福音。這一段文中“戢隱真威，同人出代”、“亭午升真”均出自《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⁴¹1625 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西安府出土以後，其碑文廣受傳教士及奉教者傳習。湯氏能在《天主正道解略》中摘引《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的表述語詞，足見他在傳揚教義時善於吸納歷史經驗。景教碑中“戢隱真威，同人出代”、“亭午升真”是從本土化的角度闡述耶穌誕生及升天，湯氏在自己的著文中引用並以此闡發耶穌降生及救贖之理。另外，亦由此而說明湯若望在西安期間，很可能親自考察過景教碑。

在闡述了天主教的基本要義之後，湯氏就開始說明信仰天主的益處，即“凡遵其教者，必與上升，以享真福。蓋天主至公，無善不報，此又比之人主，論功行賞，輕重大小，並及靡遺者然。”信仰天上真主，並遵其教，才得以享受真福。在文末中，他始終勸誡人們信仰“天主正道”，“王者”用天主之道可以使國家“俗樸風醇，人心和輯”；“君子”用天主教修身則可以“存順歿寧，永遠吉祥”；“普世之人”應當欽崇天主“以隆造物之本始，以一人生之歸向者也”。

經過文獻查蒐，湯氏所撰《天主正道解略》一文被清初天主教徒何世貞收入《崇正必辯》。⁴²康熙初年，由楊光先挑動的“曆獄”衝擊了天主教的傳教事業。作為常熟地區傳道員的儒者天主教徒何世貞，⁴³出於護教的赤誠之心，撰寫《崇正必辯》。該書前集輯錄各種材料以正天主教，後集則逐條批駁了楊光先的《不得已》。《崇正必辯》刊刻於康熙十一年（1672），是年楊光先已死三年，《不得已》傳行七年，湯若望等已獲平反。何世貞摘錄《天主正道解略》附於其書後集下卷《西儒進呈書像，普揚救世主之心》，並將《欽賜湯若望通微教師敕諭》及《御祭湯若望文》等附於後集末，可謂在正教之時，仍然不忘還原湯若望之聲譽。單從《天主正道解略》內容來看，也正說明其文簡介扼要，闡述天主教義。正如何氏所言，“湯若望《進呈書像》，陳天主教，並附及之。以備參覽。”⁴⁴此外，黃保祿《正教奉褒》中也全文收錄了《天主正道解略》。⁴⁵因此，《天主正道解略》被刻碑、刊書以流行，足見其文在闡述天主之理方面有其重要價值。

結 語

碑刻資料在天主教史研究領域具有獨特的價值，研究者可以通過一塊碑石發現更多的研究線索和重要信息。西安崇一堂所刻立的《天主正道解略碑》碑文內容來源於湯若望撰寫的《進呈書像·天主正道解略》。傳教士郭崇仁和梅高為何將湯氏所撰《天主正道解略》刻碑流傳？究其因，1627~1630 年間，湯若望在西安地區傳教，曾在奉教儒者王徵等協助下組織營建明末陝西第一座天主堂（崇一堂），且積極弘教，受洗奉教者眾。湯氏也是在這座教堂舉辦了耶穌會士發永願儀式，並且口授聖傳故事，由王徵筆記完成《崇一堂日記隨筆》。湯氏在陝有揚教奠基之功，再者崇一堂也是其來華營建的第一座教堂。當《進呈書像》出版後不久，《天主正道解略》即被刻碑。郭梅二人此舉也是在情理之中。不容忽視的是，《天主正道解略》在宣傳天主教義方面具有簡明扼要的特點，文中闡述了天主最高主宰、性體自立的屬性，也宣釋了天主降生、救贖群生的教理。湯若望在文中引用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的“戢隱真威，同人出代”、“亭午升真”，可見湯氏在西安時應當實地考察過景教碑並仔細讀過碑文，所引碑文都關涉天主降生。在說理風格上，湯氏行文邏輯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利瑪竇《天主實義》的論述方式。此外，就目前查尋結果而言，這篇不足千字的小文具有一定的影響意義，因為其文後來被收入到何世貞的《崇正必辯》和黃保祿的《正教奉褒》。

①因碑題為“天主正道解略”，故稱《天主正道解略碑》。

②見任志平：《明時天主教流行於陝西碑考》，北京：《中國天主教》，1988年第1期。

③其意為“負此甘飴之十字架，甘飴之釘，甘飴之任”。

④此處錄文據上引任志平文及現西安北堂所複製的《天主正道解略碑》，並參照湯若望：《進呈書像·自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

⑤癸未年仲冬即崇禎十六年（1643）十一月。

⑥應為 SOCIETATIS。

⑦ANNO DOMINI 的縮寫。

⑧M.DC.44 即 1644。這裡顯示拉丁文年份與中文不一致。疑拉丁文數字是後補刻上去的。

⑨明萬曆丙辰（1616）。萬曆四十八年（1620），明神宗駕崩。“萬曆後二十三載”，指 1643 年，即跨越萬曆之後天啟、崇禎兩朝時間（1621~1643 年之間 23 年）。

⑩湯若望：《進呈書像·自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

⑪⑫黃伯祿：《正教奉褒》，光緒甲辰仲秋月（1904 年八月），上海慈母堂排印，徐家匯藏書樓藏本。另可參見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 275~276 頁。

⑬此外，羅馬國家中央圖書館、奧地利國家圖書館、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等也藏有《進呈書像》。

⑭⑮⑯⑰⑱⑲ Alfons Văth SJ,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1, p. 111, p. 75; p. 72; p. 84; p. 81; p. 72; pp. 72-73; p. 86.

⑳湯若望：《進呈書像·自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

㉑清初西安城內五味十字天主堂建成後，糖坊街天主堂被稱為“北堂”，五味十字天主堂被稱為“南堂”。

㉒⑳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馮承鈞

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168~169 頁；第 225 頁。

㉓王徵：《遠西奇器圖說錄最·自序》，明刻清印本；王徵：《崇一堂日記隨筆》，梵蒂岡圖書館藏本。

㉔㉕㉖王徵：《崇一堂日記隨筆》，梵蒂岡圖書館藏本。

㉗李爽學：《太上忘情：湯若望與王徵譯〈崇一堂日記隨筆〉》，載《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 年。

㉘㉙㉚㉛見《天主正道解略碑》碑文。

㉜㉝利瑪竇：《天主實義》，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Chinois 6822。

㉞㉟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杰校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 15 頁。

㊱王徵：《畏天愛人極論》，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Chinois 6868。可參閱林樂昌編校：《王徵全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年，第 120 頁。

㊲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 19、33 頁。

㊳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

㊴何世貞：《崇正必辯》，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Chinois 5002。見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 Dudink）、蒙曦（Nathalie Monnet）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十六冊，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09 年，第 1-194 頁。

㊵何世貞，字公介，常熟人，生卒年不詳。其傳道員身份見周萍萍：《江南傳道員何世貞及其〈崇正必辯〉》，北京：《國際漢學》，2006 年輯刊。

㊶何世貞：《崇正必辯》，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Chinois 5002。

作者簡介：丁銳中，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西安 710065

[責任編輯 陳志雄]